



第三世界神學家

合一協會簡史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日至十一日在香港舉行的第二屆亞洲神學家會議開幕詞)

Virginia Fabella 著
林瑞琪譯

我以為用以下問題來作為第二屆亞洲神學家會議的開端，會很切合時宜的：正當香港面對前途不明朗的困擾之際，為甚麼我們這群來自十五個國家的四十多位與會代表，要遠涉重洋相聚於香港呢？神學家會議究竟又能與九七問題產生什麼密切關係？我相信驅使我們聚會在這裏的動力，是我們對復活的基督的忠誠，我們對聖神的改造力量的信心，以及我們對亞洲人民的深切愛護和關懷。

我們選擇了「今日亞洲人民對歷史進程的信仰反省」為主題，籌委會邀請我在會議的開幕禮上簡介第三世界神學家合一協會（EATWOT）的歷史。如所周知，這個協會

曾贊助了第一屆亞洲神學家會議，亦將駕輕就熟繼續支持我們去認識今屆會議的主題及發展。

第三世界神學家會議的成立可溯源至一九七六年，當時二十一位來自亞、非、拉國家的神學家相聚於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展開有關第三世界的交談。事實上，舉行會議的靈感來自一位非洲扎伊爾的神學生，他名叫ABBE BIMWENYI。他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問題，發覺尚未有任何神學團體組織，能如其他社會及經濟組織一般，促進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了解及合作。正當一些第三世界神學家

開始質疑西方神學對本地獨特境況的適宜性及切合性，並開始注意到要建立一個神學組織以研究本地實況及神學時，傳統的神學仍然主宰著各地的基督徒教會。第三世界的天主教與基督教人士尚未聯合起來，向西方神學發出有組織的挑戰。達累斯薩拉姆會議是一個轉捩點，它從窮人及受壓迫者的觀點去看基督信仰。這次會議給第一及第三世界的神學圈子帶來如此巨大的衝擊，以致一位歐洲神學家會稱它為「神學界的萬隆會議」。（註：萬隆為印尼一個城市，六十年代初期曾在該城舉行過一次突破性的第三世界會議。）

達累斯薩拉姆會議的參加者都同意，必須發展一個新的神學模式，以回應第三世界的窮人及受壓迫者的需要和問題。這個新的神學模式有兩大特色：

首先，它強調神學研究過程中，必須包括對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現況的分析。與會神學家探索了「第三世界特色」的根，認為假如缺少了批判性的分析，就不可能把上主對第三世界社會的意旨解釋得有意義。

其次，新的神學方法要求積極的參與，視之為神學反省的先決條件。這與傳統神學方法截然不同，因為後者通常只發生在學術圈子、圖書館以及各大學內，與今日人民的生活及掙扎頗有距離。

達累斯薩拉姆會議結束時，與會者決定組成第三世界神學家合一協會。雖然在神學取向及重點上，他們仍有很多分歧，而這些分歧在交談過程中很明顯，但到最後，大家都開始認識到交換意見的價值，以及彼此在共同目標上繼續努力的重要性。在他們的臨時憲章上，這個會議的創會成員界定協會的共同目標，就是要「繼續發展第三世界神學

，使之為教會在世的傳教使命服務，在爭取社會正義中，見證在基督內的新人性。」第三世界神學的發展並不意味著要完全排拒西方神學或神學傳統的優點，而只是從另一個起點，即從「歷史的暗處」，去表達我們對復活之主的信仰。

為了貫徹推動第三世界神學的目標，這個新成立的協會決定繼續進行交談，而在將來，每次會議則會以一個大洲為焦點。這會有助於每一個大洲去研究其本身所關注的問題及實況，並評估基督教會及其神學在各地區的特殊反應。七六年會議以來，第三世界神學家合一協會已組織過五次洲際會議，其中三次會議分別以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為焦點，在加納、斯里蘭卡及巴西舉行。第四次會議在印度舉行，目的是綜合上述三個會議的成果。最近，亦在日內瓦舉行了一次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神學家之間的交談。



一九七九年一月於斯里蘭卡 WENNA-PUWA 舉行的會議，以亞洲為焦點。與會的基督徒多達八十人，大部份來自亞洲國家，這就是第一屆亞洲神學會議。當時的籌委會完全由亞洲人士組成，主題是：「亞洲爭取完滿的人性：邁向一個切身的神學。」

會議期間，我們很快就找出爭取人性尊嚴的主要團體，包括：城市和工廠工人、農民及鄉村工人、城市的邊緣者、少數民族、婦女、青年及學生。籌委會安排了一連三日的的生活體驗，讓與會者與上述團體生活在一起，作為會議的前導。

我們隨即發現到，與這些掙扎團體認同，以及分析他們的處境是一回事，而對這些團體的掙扎作信仰反省又完全是另一回事。雖然在最起初的時候，第一屆亞洲神學家會議已了解到她本身並不以發展亞洲的系統神學為主要目的，但對何謂「切身神學」則仍是眾說紛紜。結果，會議期間就免不了爭持及挫折了。

爭持點之一起自斯里蘭卡的 A. PIERIS 的演辭。他講及亞洲神學的「宗教和文化的幅度」時，提出亞洲的赤貧及其不同面貌的宗教已構成了兩個不可分割的事實，變成所有真正亞洲神學之母，導致對亞洲處境的特色採取兩極相對的立場。大家都同意應該深入研究亞洲的處境，但對亞洲的特色却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一方面，菲律賓的代表認為亞洲處境的主要特色就是「第三世界的特色」，即是赤貧及受壓迫。為他們而言，「第三世界特色」是本質，而「亞洲」則只是一個形容外表的字眼。因此，必須強調亞洲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實況，以及人民所力圖解除的赤貧及不義制度和結構。這不但適用於亞洲處境，也可運用於由此而產生的亞

洲神學。

另一方面，斯里蘭卡及印度的參加者則認為，亞洲的貧窮實與第三世界的其他國家情況並無分別，但與其他貧窮的國家比較，亞洲的特色是宗教生活。因此在探索一個切身的亞洲神學時，必須強調「宗教及文化幅度」，以及亞洲其他現存宗教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個主要爭持點則環繞在亞洲神學的「製造者」問題上。一些與會代表，尤其是菲律賓代表均認為，一個有意義的亞洲神學必須從具有解放意識的亞洲貧民當中產生出來。在爭取圓滿的人性尊嚴的過程中，必須由草根階層的人反省及說出他們的信仰生活經驗；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士在這個過程中只能充當「技術人員」。

另一些與會代表，尤其是斯里蘭卡及印度代表則認為，神學既是一個依據歷史，從現實生活處境出發的過程，在制訂有系統性綜合的表達上，就必須由聖經及神學方面的專才、社會科學家、教會官方人士等去負責。

不過，在爭持及挫折之外，第一屆亞洲神學會議亦有很多有價值的交流及具深知灼見的貢獻。在這方面，我想把 PIERIS 文章中的兩點介紹給大家：

(1)亞洲人的處事態度着重協調和諧，與西方側重二分對立的方法有所不同。在亞洲，對神的經驗與對人的關懷調協一致，言語和寂靜混然為一，目的與方法聯結一起。在亞洲的文化當中，方法與目的既是分不開的，故此我們可以清楚結論出，亞洲神學方法本身就是亞洲神學。

(2)解放神學的方法，把實踐置於理論之上。它不單要正確地教人與亞洲的窮人（包

括大多數的非基督徒)團結一致,更要表示主動參與他們爭取正義及自由的行動。亞洲非基督徒的解放經驗既反映在他們的宗教生活上,也反映在他們爭取更合乎人性尊嚴的行動中,故我們身為亞洲基督徒,便應尋找出一些謙虛地參與他們的解放經驗的新模式。因此,我們尋找基督在亞洲的容貌時,不該太注意教會內的基督徒生活,却應着重生活在有形教會以外的天主子民對神的經驗(以及對人的關懷),因為教會應該捨棄自己,徹底投入人群。

儘管很多事情仍未解決,與會者離開時都感到相當滿意,對未來切身的亞洲神學的前景,滿懷希望。大家都同意,亞洲神學必須來一次徹底的改造。

第一屆亞洲神學家會議的最後聲明有以下四大要點:

(1)在億萬亞洲人的貧窮、被剝削及軟弱無能的處境中,亞洲神學必須有一個肯定的解放性突破。(這點似乎是要肯定達累斯薩拉姆聲明,認為關注窮人及受壓迫者是神學反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2)若要使神學真正的亞洲化,則必須深入亞洲的歷史文化境況中,與之一同成長。它必須與各大宗教的智慧及價值觀整合。這種整合不應只停留在知識層面上。因此,對於既自稱力求本地化或本色化,却又與人民爭取正義及人性化社會的行動分隔的神學,值得我們加以質詢。

(3)神學既關注到亞洲人的實際生活情況,則必須包括「社會的分析」,而這種分析又必須跟上歷史發展的快速步伐,以確保對經濟及社會結構、制度、意識形態,尤其是對那些束縛著人而非解放人的因素,繼續予以評斷。

(4)因此,神學可視為人在歷史處境中與上主相遇的清晰反省。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復活事跡所啓示的是同一個天主。因此,記載了耶穌事跡的聖經,是神學所不能或缺的一個源流。

事實上,第一屆亞洲神學家會議所觸及有關亞洲切身神學的一些主要因素,有待日後其他會議,尤其是一九八一年的新德里會議去深入發展。新德里會議的主題是:「第三世界的突破:神學面臨的挑戰。」

第三世界的突破表示了歷史上新力量的成長,指明窮人及受壓迫者當中已升起一股新的意識,加強抗拒來自第一世界的控制力量。新德里聲稱這出人意表的運動為「被剝削階層、邊緣文化及受屈辱種族從歷史下層上昇到長久以來為西方所控制的世界的突破」。這是宗教信仰者及少數民族肯定他們的真正身份的突破,也是婦女要求承認及平等,以及青少年反抗強加的制度及價值觀的突破。總之,這是所有爭取圓滿人性及合理歷史地位的人士的突破。

新德里會議的與會者均肯定亞洲基督徒不應在為人民爭取更大平等、公義和自由的歷史過程中做一個旁觀者。他們必須置身於這種服務之中。這實際上就是耶穌的解放使命。(新德里聲明,72號)基督徒的參與確是信仰的行動。不過,行動當中不可缺少祈禱和默想,否則便會流於純粹行動主義了,「而我們參與上主的解放及滿全歷史的行動當中,也變得只是看見主局部的面貌,聽聞主局部的工作。」(新德里聲明,39號)

對現存不平衡及不平等情況的抗議正在增長中,亞洲神學對此不能忽視。但由於第三世界大多數人士信奉其他宗教,因此,第三世界的突破可以說是非基督徒社會的突破



。它在歷史中發出自己的呼聲。假如神學不是向這個非基督徒的世界說話，或不是透過這個非基督徒的世界說話，就會如同新德里聲明所指的，神學變成了「少數基督徒圈子中秘傳的奢侈品。」事實上，在亞洲，如果不向大多數非基督徒講話，神學更新就不會出現。非基督宗教的經典及傳統，為我們也是啓示的泉源。除非重視人民的宗教根源和經驗，任何社會改革都不能有效，也不能久延。目前，西藏、伊朗及印度就是三個很鮮明的例子。

新德里會議期間，對貧窮所採取的態度及了解的分歧亦受到正視。很多第三世界人

士只從經濟角度看貧窮。但是，為亞洲人，貧窮亦有一種宗教意味。它可以是罪惡，亦可以是德行：當貧窮是從外界強加於人身上時，它是罪惡；當貧窮被人甘願接受，用以抗拒個人的貪念及佔有慾，則是德行。以佛教僧尼的實踐為例，他們的自願及宗教性的貧窮，不但有助於他們擺脫物慾的困擾，更可以成為遏止亞洲社會日益嚴重的消費主義的有效藥方。

所有第三世界神學家協會的會議均一致承認，不公義及壓迫不但來自經濟、政治或文化，也源於性別、種族、社會階層及少數民族，所有這些因素都互相交織，彼此關連。第一屆亞洲神學家會議期間，我們試圖強調，亞洲女性所受的壓迫往往是雙倍甚至是三倍於男性。新德里會議中，亞洲代表一致認為，婦女的次等地位及受壓迫等問題實不容繼續受到忽視。其總結文件指出，除非我們根除這些歧視，並在尋找一套有意義的神學過程中能包括婦女的前景，否則不會有任何真正的社會改造，亦不可能有真正的神學更新。

亞洲神學要是不涉及擁有近半數亞洲人口的中國，就委實不恰當了。第三世界神學家合一協會從開始就注意到中國對亞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衝擊，可惜到目前為止，我們仍未與中國大陸內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建立交談。

毫無疑問，重新塑造神學的工作已經在亞洲展開。第三世界神學家合一協會亞洲區分會承認，在與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北美洲的一些少數民族的交談中，我們獲益良多，而其他宗教及意識形態所給予的啓發，亦使我們受惠不淺，特在這裏向他們深致謝意。

現在讓我借用印度天主教教義神學家 SAMUEL RAYAN 於一九八三年一月在日內瓦第六屆第三世界神學家合一協會會議中演講所提及的幾點，來總結該會亞洲區分會過往所作的努力：

(1) 一個能為生命整體服務的神學，應該源自信仰與亞洲實況的交匯點，包括亞洲人民、亞洲的貧窮、亞洲的政治及經濟處境、以及亞洲的宗教特性。

(2) 亞洲神學的主要資源就是它的人民以及他們的文化和宗教傳統的解放潛質，包括其淵源悠長的經典、神話、以及他們的靈修歷史。

(3) 亞洲神學是我們發現和聯結天主的一個歷程，而祂就是那位與亞洲大多數窮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天主。由於亞洲的窮人大多數是非基督徒，因此在窮人身上與天主相遇，就是在非基督徒窮人身上，在他們的信仰、希望和標記上與天主相遇。

(4) 亞洲神學尚需多多注意天主介入歷史的行動，具有突破性的一面。長期以來，我們把天主視作法律和秩序的監護者，祂喜歡保持「現狀」。神學應皈依那位與婦女、與沒有田地者、與社會低層人士、與失業者、與受束縛者、與饑餓者、與受屈辱者及與受傷者認同的天主。

介紹了有關第三世界神學家合一協會的歷史後，讓我們看看今次第二屆亞洲神學家會議的主題，即「今日亞洲人民對歷史進程的信仰反省」。這一屆會議既繼承上屆會議，便應超越上屆，更深地反省亞洲人民在爭取新人性上的努力。我們的主題要求我們傾力合作，尋找出亞洲人民在爭取天國的正義、真理和愛的過程中天主啓示了些什麼。我們祈求聖神光照我們和賜予勇毅的恩寵，使我們在參與亞洲人民追求一個新的社會和新的自我的過程中，能與亞洲人民一起發現基督在亞洲的新面孔。